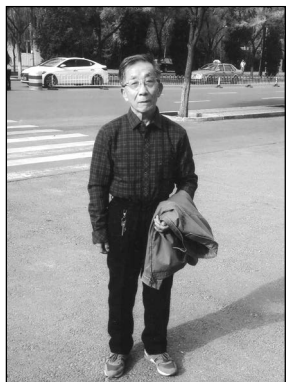


清华魂 伴我行

○于洪彬（1964 冶金）



于洪彬
学长

1958年9月3日，是我在清华报到的日子。在我心目中，生日是我人生的起点，而这一天则是我事业的起点。这两个起点都十分重要，所以永记不忘。

这天早上，前门火车站清华迎新站的同学，让我们十来个刚刚到京的新生乘上一辆解放牌大卡车，一起到学校报到。汽车穿过繁华的市区后，从当时的南校门驶入清华园，把我们送到了当时的“北院”。“北院”是全校新生报到的总站，十分热闹。报到后才知道，我被分配到“机409班”，我的宿舍就在七号楼，楼下的七饭厅就是我们的就餐之地。

正式上课的前一天，我们班全体同学聚到了一起，在一片树荫下席地而坐。召集人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李伟，她郑重地告诉我们：从今年起，清华的学制由五年改为六年，清华的校训是：“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”。她对校训的深刻含义没

做说明，只是希望大家今后在校学习的六年中，结合生活、学习所遇到的各种事情逐步加深领会和实践。接下来便是“自报家门，相互认识”。我们这个班的同学，分别来自福建、内蒙、新疆、东北等地，其中来自北京的最多。说话的腔调也是五花八门，有一位从东北来的同学，说起话来满口是“我们那疙瘩”，便获得了一个绰号——“小疙瘩”。

1959年是建国十周年，学校通知我们：在国庆十周年庆典的阅兵式上，要以“清华民兵师”的名义，组建一个重机枪方阵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。我被选中，每只机枪有七人。经过一个多月的操练，还通过三次到天安门广场进行夜间彩排，终于在国庆节当天，顺利地通过了阅兵仪式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。

入学两年后，学校对我们进行了按专业划分班级，我被分到“金41班”。

“金”是专业的代称，它的全名应是“金属学与金属材料专业”。这次班级划小了，我们班共24人，其中女生4人。全专业共4个班。当时专业课所用的教材全是苏联的课本，其中有一部分是已经译出后，编成讲义，供教学使用，还有一些干脆就是原文的，这时老师会在黑板上直接写出该书的作者、俄文书名，供大家选用。由于中文资料太少，所以客观上逼迫我们利用周日的的时间，到东单、西单的老

书店去查找。还真的没白费功夫，找到了几本俄文原著。由于从初、高中到大学都是学的俄语，另外，俄文的语法也比较简单，加上我对俄文也比较喜欢，经过一段时间的阅读，很快就轻松地过了关。除了掌握专业知识的面扩大了，对俄语的掌握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。

转眼之间，毕业分配开始了，我被分配到内蒙包头市一个兵器系统研究所。上世纪60年代，包头十分落后，人烟稀少，市容破旧，交通不便。街上经常见到马车、毛驴车，甚至还有骆驼拉的大车。大点的商店屈指可数，建筑物四周常常是未清理的沙丘。有时半夜里刮大风，清晨醒来时，头、脸上、整个被子都蒙上了一层细沙面。但工作环境却令我十分满意和高兴，看到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威武地站岗，让我对这个研究所萌生了一种敬畏和神秘感。这个研究所一定是个国家的重要部门，我能在这样的单位工作，真是太好了。所里的人知道我们是清华来的，大家都十分敬重。

1966年11月的一天，所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，口授我一项绝密任务：你与何XX二人，携带行李和生活用品，必要的测试设备，测试样品，到北京后字215部队报道。这是一项绝密任务，不要对其他人讲，执行任务期间不得与任何人有任何联系。到了后字215部队后才知道，我们这次是到戈壁滩参加核爆实验。他们早已开始着手准备：组建一支军用专列，把全部的装备、仪器和后勤所需，连同参试人员一并用火车运往目的地。闷罐车就是我们的临时住处，把行李放在稻草上，一个挨一个，排成一行。我们这支专列在

长辛店经铁路部门编组后，便沿北线铁路开始西行。

专列不像普通客车那样按规定时刻到站停车、开行，专列有时一口气能开上几个小时不停，有时在很小很小的车站停上很长时间。停车时间长时，会就地生火就餐，这时多是吃面条，或再发两个鸡蛋，一根香肠。车过银川之后，铁路两侧很难见到树木、野草，多是荒漠。经过六天六夜的行程，我们终于到达目的站——吐鲁番。当天在吐鲁番兵站休息，过夜。次日早饭后，我被指派上了一辆解放牌卡车，车上已经装了我们用的测试设备和被测的样品。此时，我猛然感觉到，此次试验工作组织得十分周密，一切都在默默地按计划进行。

汽车出了城区，便沿着唯一的一条通往场区的公路疾驶。司机是一位年轻战士，一路上话语不多。路面时好时坏，好的是柏油路，坏的是搓板路，搓板路颠簸得很厉害。司机开足了马力向前方奔去，中午到了一个小一点的兵站，大家亲热地握手，双方都备感亲切。在兵站过夜后，次日继续前行，下午终于到达了目的地——我们这个大队的宿营地。宿舍是窝棚式的马架子，从地面往下挖了近一米的深度，睡人的一侧铺上了稻草，行李就放在上面，顶部是用木杆支起，形成三角形，上面盖上一层稻草。我们的驻地距爆心是30公里。

当下我的主要任务是两项：其一是每天到爆心附近与其他同志一道布放试样。以爆心为中心点，沿径向布置了若干条效应线路，供放置不同的效应物。我们的样品沿其中一条线向西方向布放。为防止

样品被冲击波吹跑，试样盒被牢牢地固定在一条足够长的钢丝绳上，钢丝绳埋在土中。我还记得在起爆前一天晚上撤场时，卫生大队拉来了一卡车狗。当把狗笼子从车上搬下时，他们有的狂吠不止，有的漠无表情，有的因晕车而呕吐，工作人员把它们按不同距离布置在轴线上，这些狗有的头朝向爆心，有的让侧身对着爆心，有的还把肚子一侧的毛刮掉后对着爆心。当我们乘车返回驻地时，黑夜里这些狗叫声，给荒凉、安静的旷野带来一丝悲凉，不知明天这些生灵会是什么下场。

我的另一项任务是适应性训练。我被指定为零时后进场取样的人员之一。为确保进场人员的生命安全，要求每个进场人员配备防毒面具的时间至少要达到八个小时。为了达到这一要求，每天早餐后，我们要戴上防毒面具，在戈壁滩的石子路面上没有目标地走上四个小时，然后折返回来。就这样走了半个月，总算达到了要求。这项工作对我来说有点小麻烦，因为戴上防毒面具就没法戴眼镜了，后来就把镜片取下，用胶布粘在面具的玻璃片上，但由于视物焦距不准，头还是有些不舒服，但总比不戴眼镜好些。

这次核爆的零时定于1966年12月28日上午10时（新疆时间）。吃过早饭，我们进场取样的三个人早已换好了全套的防护服。为了观看蘑菇云，大家列队后席地而坐，边听基地电台的广播，边等零时的到来。当喇叭里传出：现在是零前一分钟，请戴好防护镜……随着指挥人员的“十、九、八……起爆！”的号令发出，眼前猛然闪出一团火光。闪光过后，摘下防护镜观看，只见一团烟雾出现，并缓缓升起，

随着上升高度的提升，逐步形成了完整的蘑菇状。此时，人们开始欢呼，跳跃。一分多钟过后，才听到从爆心传过来的爆炸后的隆隆声。随后，我们进场的五个人（包括司机二人）在卡车前列队。领导向我们交待：装有试样的钢丝绳已被坦克牵引到距爆心五公里的地方。防护服口袋里的剂量笔最大量程是5伦，当剂量达到0.5伦时，你们可以撤场。另外每人身上还配有一个“胶片盒”，辅助测量受到的剂量。希望你们相互配合，齐心协力，圆满完成取样任务。领导讲话之后，我们齐声喊道：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！”我们上车之后，汽车飞速地驶向爆心方向。

在距爆心五公里的地方，我们三人下车，司机和副手在车内，汽车处在不熄火的待命状态。当我向爆心方向望去时，发现原来几十米高的钢制塔架已不复存在，剩下的长约两三米高的角钢弯曲地插在塔架的水泥地基里；塔架旁的四层楼房已被吹得无影无踪，夷为平地。取样进展得不像预料的那么顺利，原因是我们戴了三层防护手套，太厚，太笨了。在我们大约完成三分之一的工作量时，取出剂量笔一看，我们受到的照射剂量已经超出了5伦的红线。由于带着面具，互相交流很不方便，听不太清讲话内容，只好用手势和表情来表达。于是大家加快了速度，直到把全部样品回收完毕，才乘车离开场区。

乘车返回的第一站是“干洗站”，名称是“站”，实际上只有二名穿了防护服的战士。他们先用剂量仪测我们身上的剂量，当探头刚刚靠近我们时，他们就大声叫起来：“你们到爆心去了？”我们没有

回答。随后使用压缩空气吹掉防护服上沾染的附尘，并把剂量笔和胶片盒收了去，并让我们乘车去“湿洗站”。“湿洗站”实际上就是用帐篷搭起来的临时洗浴的地方。我们洗浴完毕换上了自己的衣服，此时午饭已经送到帐篷之外，但我们开始感到头晕、恶心、浑身无力，根本不想吃东西，只想躺下来，好好睡一觉。回到宿舍便昏昏沉沉地睡下了，晚饭的欢庆聚餐也无法参加。大约到了晚上11点多钟，领导来告诉我：吉普车就在外面，基地首长决定马上把我送往马兰医院住院治疗。于是我穿好衣服，半坐半卧在座位上，任凭它怎么颠簸，都无法打起精神。经过几个小时的疾驶，终于到了医院，入住外科。虽然已是后半夜，但医生和护士早已做好了一切准备，热情地迎接。到了病房才知道，我们取样小组的五个人又相遇了，还住一个病房。次日，医生告诉我们：我们的白血球都在34以下，要特别注意不要感冒，好好休息，恢复体力。目前，对受射线照射这种情况尚无有效的针对性治疗药物。我们隔壁房间里住的是两位飞行员，他们的情况比我们严重，整天呆在房间里，还戴着口罩，据说他们是驾机穿越蘑菇云空中取样时受照射的。

1967年元月2日，这天基地1号、2号二位首长专程来到医院看望我们。首长说：试验成功后，周总理亲自打电话询问有关受伤人员的情况，并嘱咐我们一定要妥善处理。在大夫的陪同下，首长手里拿着名单，一个一个地念名字进行对号认识，顺便也把每个人受到的照射剂量念了出来。原来我们五个人受到的照射剂量都在20伦以上，在此之前，这个数值对我们

一直是保密的。在马兰医院住了二十多天之后，大部队的任务已经完成，为了行动方便，我决定随大家一起走。离开医院时，医生告诉我：回到工作单位之后，马上到辽宁兴城“八一疗养院”休整一个月。原以为疗养结束后，此次特殊任务算是完全结束了，没想到的是，回到单位正常工作之后，接到了内蒙防护监测所的通知：根据国务院的文件精神要求，由于国内受到像你们这样大剂量照射的数据不多，也为了对你们的健康负责，要求对你们每年进行一次体检，并且是终生追检，不能中断。为此，我曾有过3—5次体检，但后来就无声无息了。

我在三十多年的兵工科研工作中，经过努力拼搏，取得了一些成绩，值得一提的是获得一项国家发明三等奖，另一项是由国防科工委颁发的科技进步一等奖。这后一项成果已经成功地用到部队，可以说为军队、为国防贡献了一份力量。

从科研一线退休后，我又被所内的试制工厂返聘，负责热处理方面的工作，曾先后为该厂开发两项产品，产品质量获得神华集团的好评，同时也为该厂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质量信誉。1977年，我被选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人代会代表。

如今我已步入古稀之年，母校要求我们“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”，算起来，我基本上达到了这个要求。当下，我的生活重点是“健康第一”，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利国、利民也利于自己。回忆起离开学校后所经历的种种事情，我总是觉得，清华给了我一种无形的精神，是它陪伴我一起走了过来。